

从救亡图存到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的内涵拓展

岳游松 刘素萍

【摘要】现代化作为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不同的历史阶段锻造了不同的体育观念机理。引入身体作为体育观念的分析工具,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的迁延与更新。发现近代以来体育观念大体经历: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存亡的危机,改造身体以强种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观念转向了为国家建设以兴国,强调了对身体的模塑;改革开放时期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主旨,身体被重构,以适应市场发展需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人民至上”理念的引导下,体育观念的演变不仅加强了人的主体性在体育发展中的地位,也呈现出体育与人的共同发展的普世关怀。身体作为权力—话语—知识的运作基点,从被动规训到主体性凸显,也就是体育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内涵不断拓展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体育观念;身体;内涵;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岳游松(1975—),男,河南驻马店人,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刘素萍,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天津 301617)。

【原文出处】《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2.1~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TY001)。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活动,就其活动的性质而言,是人对自身自然的自觉改造;就其活动的意义而言,是人对自我生命的自主彰显^[1]。观念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过程,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与问题,从而形成不同的旨趣和思路^[2]。体育观念作为对体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看法,反映了人们对体育认识的价值取向^[3],其发展历程并非只是人类对体育现象认识和思考的铺陈,而是涵盖体育与其他社会机体之间的互动^[4]。体育观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历史情境下,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它仍然是我们今天分析体育现象、解读体育问题的主要思想来源。

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的内涵拓展问题,其实也是从又一个侧面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事业的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近代有志之士在尚力思潮中的“救亡图存”之道到新时代强国建设中的“人民至上”的时代弦音^[5],如何找寻合适的切入点,既能够串联起百余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的迁延发展,

又能够折射出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普世关怀,的确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1 理论引入:身体作为体育观念的分析工具

现代化作为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不同国家和民族因社会形态、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资源禀赋、历史环境的差异以及时代发展的变迁,其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也不尽相同^[6]。回顾百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中体西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维新运动推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主权在民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关注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体育也从操体练兵、强身以救国到体育强国、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健康需求与美好生活需求的观念转变,从呼吁全民改造身体的改造活动到公民自觉参与体育运动的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技术,被纳入权力运作的体系,形成了权力—知识—身体的谱系学分析。身体作为体育运动的载体,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身体被社会机制的形塑来探索体育观念的变化,也

是透过身体审视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意义生产的过程。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主要是基于“有序符号系统”，通过一整套的“符号或语言，构成一个完全透明的媒介，由此可以把表象与被表现的事物联系起来”，一连串的符号基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构成了一定权力基础之上的观念和社会稳态^[7]。于此，从权力—知识—身体的谱系学进行分析，循着“身体—体育—观念”的脉络，把人放回具体的历史进程、社会情境中进行考察，这种进程也是由外在推动控制逐步走向内心自觉诉求的互动过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体育观念的演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体育观念体系。历史演进中，社会的变迁和制度的更替往往直接影响体育观念的演变，对体育的诠释方式和对体育活动的期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动因不仅是体育观念多元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得以内涵拓展的历史语境。

身体是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体育观念的实践载体。体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的表达和运动，通过身体的参与与实践，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和理解才得以形成。身体文化构建从物质层面塑造了体育活动的形式和方式，通过不同的身体表达形式，体育观念得以在社会中传播和沉淀。体育身体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和审美标准，从而塑造了对体育的期待与体验，这直接影响了体育观念的形成。身体文化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科技进步的演变，从而推动了体育观念的更新。

2 觉醒与改造：强种救国的身体表达

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意识觉醒中摸索，从保种、救亡到革命、抗战，身体逐渐从“东亚病夫”的象征转变为国家力量和国民意志的表达。国家在打破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社会管理结构，于是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国家并没有完全退场、社会开始出场的自发性强民救国的运动^[8]。描绘了体育在社会的觉醒与身体的改造中的作用。

近代中国为挽救民族危亡，引发了国人衰弱之因和图强之道的思考。“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理念。军队实行兵操，加强体魄修养、提高自卫之道，鼓励各级学校青年学子与社会普通民众参加体育锻炼，强壮身体、以御外侮。鸦片战争后，身体话语在民族危

机中凸现，以人体喻说国事盛行，身体不仅成为国家喻体，而且还是国人强种救国，追求“新民”进而“新国家”反观自身的载体^[9]。这一时期，身体成为“族力”或“国力”建构所倚恃的对象，体育改造的身体成为其强弱的存在。

晚清以降渐次兴起的救国思潮中，国人身体逐渐成为瞩目焦点。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下，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开始在中国亮相。西洋体育对军队进行操练，成为当下“重振国威”的呐喊。随着西学渐入，甲午战争失败后，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和“东亚病夫”的身体之耻，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意识渐强。严复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下，提出要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强调三育并行。认为新国民，需增强国人体格。“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於此焉肇分”^[10]。近代知识分子，基于中西比较，对中弱西强进行思考，将身体作为考量对象，认为“人的外在体格健壮和勇猛善战对于保国保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11]。在民力的探讨中，尚武、军国民体育思想诞生。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署名提出发动国民改造运动，梁启超对“新民之道”中“三民”进行强调，内含强烈的身体改造诉求，倡导“实行尚武政策，进行军国民教育”，认为要依赖体育培养尚武的精神，“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12]。号召国人“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改变“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的现状。就近代中国身体而言，一系列改造身体的话语析出，黄金麟就曾揭示近代的国势衰弱，身体如何被赋予各种新使命和新任务以臣属于国民权力体系。尚武、军国民的风气也对近代中国体育教育产生了影响。1903年，清朝政府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把体育纳入教学，设置体操科，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在军国民的思想下，体操唯一宗旨就是尚武，“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以教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操严整其纪律……以造成完全之人格”^[13]。可见，尚武、军国民主义在社会精英的主导下贯穿社会话语层面和学校教育层面，将改造身体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权力与知识运作，将个人身体国家化，由此达成了现代体制与组织对国民身体从形体到内心的规训与塑造。

进入“五四”新文化时期,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个性主义价值崇尚下,个体意识确立,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体,只有人的现代化,才有国家的现代化^[14]。在学校教育中,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引入了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推崇自然活动,主张体育即生活,体育即教育,反对人为体操,倡导体育要顺应人的心理和生理本能。体育锻炼并非仅仅是“外练筋骨皮”,而是以体育锻炼教育学生要肩负国家当下的历史使命,身体康强才是完成使命的根本。《体育之研究》提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5],毛泽东把身体与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提倡武勇世风与对“野性”的呼唤,把民众身体的考量直接嵌入近代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之中。“九一八”事变后,救亡成为时代洪流,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名义下,个体话语被遮蔽,身体成为民族想象的工具。早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工农群众开展体育运动,为革命和抗战服务。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先后发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锻炼身体要经常”“体育运动军事化”等号召,并身体力行,以动员、号召工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16]。中央苏区体育以“一切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总原则为指导,提出了“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与“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指导思想^[17],注重锻炼身体,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学校体育课加强了军事锻炼,增加了学习侦察、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实际技能。

在革命的情境中,身体政治化被延续,成为国家权力和革命话语形塑的载体。革命的身体变成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而中共后来也乐此不疲地将这种动员身体的技艺,当作是治国与治理身体的方式^[18]。

3 建设与训育:育体兴国的身体模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变革,希望将整个社会有序组织起来,重建基层政权,推进国家力量向基层延伸,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建设现代化国家^[19]。在这一历史实践中,身体并未因时代思潮转换而退场,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充当塑造“新人”的角色^[2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坚持党与人民思想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均衡发展理念。在该理念指引下,体育事业上升为党和国家意志,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调控

与支配。这一时期,集体主义的知识话语取代了个人、家庭主义,身体具有社会主义生产者、建设者的使命,身体教育或身体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国家的建设者^[21]。此时,身体成为社会治理的对象,体育也在生产革命中被形塑。如何普及体育运动,强健国民身体,释放社会生产力,使他们能够担当起国家建设的重任,成为当下的政治化的议题。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等国民体育都围绕这一时代命题展开。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提倡国民体育”。同年10月,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筹备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我们的体育事业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对人民体育的方向和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体育不仅是强健体魄,“还必须为生产与国防服务,才有广泛发展前途”^[22]。国家通过话语权力把普通民众的身体开发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个人的生存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每天广播一响,千百万人随曲做操”^[23]成为1950年代的一个壮阔现象。“广播体操不仅是一种健身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时间标识,它提醒公众必须按照统一的指令唤醒自己的身体,并逐步把身体启动,以达到合适的状态投入工作和学习”^[24]。在物质匮乏、体育器材相对稀缺的状况下,广播体操也因“统一组织的集体锻炼,更加适合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而成为集体化时代城市和乡村最主流的体育锻炼项目。

国家通过话语引导、权力示范,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进而达到整合劳动力资源、提高基层社会控制力的政治目的。1954年《劳卫制》颁布,达标证书封底的“努力锻炼身体,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勉语^[25],有力地推动了国民体育的开展。到1957年,全国农村已建立起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拥有90多万会员,全国有67个县推行了“劳卫制”,10多万人达到标准,有2000多万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群众体育也得到快速发展。广播体操的流行与劳卫制的颁布,就是国家在实现生产革命与强健体魄上的完美统一。此时,国家积极强化、训练身体,调动民众的身体潜能为整个“国家主义”服务,身体成为国家的宏大叙事的载体。

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也积极通过知识、话语等途径改造身体。1952年,教育部和中央体委联合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其中

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195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要求,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逐步成为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6]。这一时期,学校体育不仅以生产和开发强健的身体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以隐蔽的、温和的规训方式,将身体为生产、国家建设服务植入民众内心。诚然,在教育场域,学校体育知识体系强化了国家权力对身体的模塑。除了群众体育对民众身体的规训外,竞技体育更是在身体政治中突显,作为国家化的身体在场最为重要的集体仪式。“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就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与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开启了竞技体育的发展。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导成立了“中央体训班”(国家队前身)。这一阶段的竞技体育承载了三重任务:国族意识形态的具身化知识建构、全民身体教育的知识普及以及国际“软”话语权力的争夺。这意味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运动就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契合起来,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

国家通过调动普通民众的身体资源,进行生产、建设,为现代化发展服务。政治话语介入其中,使得体育完全以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方式运行,这种身体政治化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国家权力通过科层制对个人进行规训,进而模塑民众的身体,以进行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4 革新与形塑:训身富国的身体重构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引领下,社会、市场介入民众的生活。国家权力逐渐减少对社会领域的直接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得“去政治化”、自主化和生活化,民众的身体摆脱了生产革命时期的神圣意义,继而转向世俗化的日常。身体不再是生产主义的劳动工具,而是复杂的社会印记。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体育体制机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变,同时在逐步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体育从“福利型事业”向“产业型事业”转变,民众

的体育观念与体育消费方式也随之改变。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商品,体育消费也不再满足一般的健康需求,而是一种文化实践,身体沦为利益生产的工具。福柯认为,“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投入,不再表现为通过压制实现控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激励实现控制的形式”。这一时期,国家对身体的形塑不再是直接的、强制的,而是一种微观的、更精细化、人性化的,是“生产性的,要生产、培育、规范和调整各方力量,是一种让人生的权力”^[27]。

1978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获得了合法席位,竞技体育与国际竞赛接轨,国际性体育竞赛成为国家间展示综合国力的重要平台。而国门开放后,中国亟须通过全球性的体育赛事获取世界对自身实力的认可,提高国际声望。于此,发展竞技体育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运动员作为竞赛的主体,在一系列的“竞技优先发展战略”“奥运争光计划”“金牌战略”等国家话语下,其身体也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符号,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载体。

在举国体制的国家调控下,针对金牌与冠军这一目标,国家竞技体育管理实行运动队统一的制度化管管理,个体完全受运动队的时空管理,这一控制身体的目的是使身体免受干扰,更加高效地生产出“有用的身体”^[28]。训练方式实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训练量的“三从一大原则”,要求刻苦训练打磨身体技术,成为实现冠军与金牌这一理想目标的唯一途径。严格的运动训练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打造一个富有纪律性的身体。运动员个人的行为在金牌目标下,受到国家科层的统一管理,犹如“驯服的肉体 and 机械的个人”^[29]。这一身体的规训具有积极意义,这一体制直接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全民体育活动热情高涨,全民健身日的确立及《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民众从事体育活动。体育在促进民众健康的同时,体育消费也从精英向大众发展,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在运动的选择上,人们开始珍视自由选择的权利,倾向于选择能显示自己身份、地位以及象征自己成就的体育项目和体育服务。消费文化打着享乐主义和满足身体需要的口号,对身体实施新的规训,这种身体规训,不再以暴力手段为支撑,而是通过所建构身体“理想类型”的吸引和同化,使得个人主动接受商业资本的规训^[30]。

在国家经济转型的阶段,体育从“福利型事业”向“产业型事业”转变,在市场化下,身体不再是国

家生产的工具,而是消费的对象,但在国家竞技领域,体育运动依然成为国家形象的制造者,运动的身体归属于国家。

5 共在与自觉: 健体强国的身体回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首位,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时代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把现代化与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凸显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指向^[31]。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体育发展领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体育发展“人民至上”的时代理念,体现为人民体育主体性的确立,即凸显人民是体育发展的“中心”,体育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体育发展的过程依靠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协调发展。竞技体育不再强调金牌至上,而是转向金牌之上^[32],这标志着体育观念发生了重大演变。在竞技体育中,提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强调拿干净金牌,提倡集体理念,体现了对全人类联结的追求。这种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竞技体育不再是纯粹追求金牌的竞技场,而是传承奥林匹克精神的平台,带动群众体育参与者的竞赛道德规范提升。倡导全民健身,提出大型赛事“全民共享”,同时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通过普及性、大众性等活动,将体育融入人民的生活,体育活动成为人们基于自身权利与兴趣的实践,体育成为人们提高身体素质、享受健康生活的主体性需求的实践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精神的文化作用得到空前重视,提出“更团结”的奥运口号,通过体育将全人类联结起来,体育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趋向“集体团结”^[33]。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的真正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夺取或夺取多少块金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

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这一指导思想在体育竞赛的定位中得以充分体现,强调在竞技场上展示的不仅是优异的体育成绩,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

在2020年9月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体现了国家对公平竞赛的强硬态度,以及对奥运精神的弘扬。这一理念增强了竞技体育的时代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和带动更多人投身体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运动员个体的角度来看,过去曾经被体制束缚、身体被支配、被征用的时代已然过去。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的完善,运动员不再简单地被体制所约束,而是呈现出主体性的追求,争取适合自己的最优价值。甚至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运动员开始展现对国家符号话语的反向征用,这标志着运动员在个体价值和国家荣誉之间找到了更加平衡和自主的状态。这种变革意味着体育不再仅仅是国家形象的展示舞台,更是运动员个体实现自我的平台,运动员不再仅仅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是在追求自身最优价值的同时成为社会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为国家和个体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国家在这一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旨在通过推动全民健身、大众体育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2017年天津全运会首次将群众项目纳入其中,近八千名业余选手、民间高手登上全运会决赛阶段的舞台,彰显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价值导向。2020年提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使体育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权利。这不仅是政策的制定,更是国家对人民健康生活的积极引导与坚实支持。民众通过休闲体育活动承担起健身、娱乐等主体性需求,这些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体育锻炼,更是民众自我提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意义建构的工具和路径。这种主体性追求的呈现,使得体育身体更好地回归日常生活,呈现出更为鲜活、主体性的状态。“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34]。体育身体成为一种“与世界共在”的、不断生成的、在时间中展开的“身体场”。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体育观念变革使得体育不

再是国家形象的综合展示,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通过深化全民健身、大众体育的推广,体育身体成为实现自我提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意义建构的工具和路径。这种主体性追求的呈现,使得体育身体更好地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更为鲜活的情境。在“人民至上”理念的引导下,体育观念的演变不仅加强了人的主体性在体育发展中的地位,也呈现出体育与人的共同发展的普世关怀。

6 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体育观念的演变如一曲激荡的乐章,奏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旋律。从“救亡图存”到“人民至上”,体育观念的内涵拓展记录着国家与社会、人民与身体之间的深刻互动,见证了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相辉映的成就,同样也从体育的层面阐释着“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观念的内涵拓展,更加明确了构建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的立足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赓续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王广虎,冉学东.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观念更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12):1-11.
- [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3.
- [3]陈丛刊,陈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体育观的价值立场与百年坚守[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3):9-15.
- [4]岳游松,郭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体育观形成与演进的语境分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4):373-377+419.
- [5]刘欣然,高楚兰,张娟.体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哲学认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6):14-21.
- [6]徐建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脉络与世界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22(3):21-31.
- [7]谢建东.身体传播视域下清初到民国发辨认同的变奏及启示[J].未来传播,2023,30(2):65-76.
- [8]陆小聪,吴吴金.体育与民情: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近代中国体育进程的再思考——兼论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反思[J].体育科学,2016,36(09):3-9.
- [9]程亚丽.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文学叙述[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 [10]胥英明.困惑与反思:后现代体育及体育课程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66.
- [11]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11.
- [12]蔡锷.论尚武主义[J].东方杂志,1905(5):99.
- [1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20.
- [14]焦扬.《共产党宣言》与陈望道研究论丛第1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12-106.
- [15]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J].新青年,1917.
- [16]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 [17]马振东.中央苏区红色体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11-32.
- [18]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 [19]李志军,尚增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2:11,95.
- [20]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1):4-14.
- [21]胡科,黄玉珍,虞重干.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中的身体线索[J].体育学刊,2010,17(9):8-12.
- [22]韩贝宁,鲁长芬,罗小兵.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百年历程、内涵特质与未来进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4):5-13.
- [23]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 [24]张阔.欲望号街车——流行文化符号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8.
- [25]陈煜.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27]徐国超.福柯的身体政治评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14(6):17-21.
- [28]Jaggar A M, Bordo S.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M]. Rutger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9]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30]赵方杜.身体规训: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D].天津:南开大学,2011.
- [31]郝立新.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4):15-22.
- [32]宋皓,钟秉枢.由“金牌至上”到“金牌之上”:部分中国人的竞技体育金牌观嬗变原因探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6):499-503.
- [33]郑国华.集体团结:人类体育价值话语传播的全球趋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1):87-100.
- [34]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